

明清之際，遺民說經：

賀貽孫《詩經觸義》評析

鍾志偉*

摘 要

明清學術有顯著差異，而明、清之際《詩》學樣貌為何？明遺民如何連接二代《詩》學史的環節？限於筆力與篇幅，選定賀貽孫《詩經觸義》，提供線索。貽孫遁入山林，堅不出仕，晚年更逃名自匿。《四庫全書總目》毀譽參半，提供反思與討論空間。從《詩》學史角度切入，評述《詩》主張、內容及方法，呈現此一「鼎革」時代氛圍，對遺民《詩》論產生之影響。貽孫兼采漢宋，折中諸說，對朱《傳》亦多批評。其次，又表現關懷天下卻獨善其身的生命哲理，顯示強烈詮經特色。再者，以多元文學手法解詩，並將《詩》與後代詩文書畫等藝術會通比較，相當罕見，最後評騭缺失。研析《詩經觸義》有助增補明清之際的《詩》學概況，盼引後人興趣，逐步解決諸般疑問。

關鍵詞：《詩經》、賀貽孫、《詩經觸義》、遺民、文學解經

本文收稿日期：2010/08/12 通過審查日期：2011/06/29

*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前言

賀貽孫（1603-1686），初名詒孫，字子翼，江西永新人，明諸生，擅詩文。明末動亂，攜母隱居山林，堅不出仕，以遺民自居，結第曰「水田居」，自號水田居士。明季社事盛行，與萬茂先、陳士業、徐巨源、曾堯臣等人，結社豫章。順治初年，學使慕名，特列貢榜，避不就，巡按御史笪重光欲舉應鴻博書，遂僧衣儒行，以浮屠逃名自匿，晚年益窮，然終身不改其志。著《易觸》、《詩觸》（按：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敕書樓刻本題名《詩經觸義》，原書闕其序跋，然參之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本補配，賀恢〈詩觸序〉及六世姪孫賀鳴盛〈跋〉文均稱《詩觸》，《四庫全書總目》亦以此稱之，蓋原名《詩觸》，其義曉明。因此「詩經觸義」作為書名，疑刊行之前，由賀鳴盛或書商增衍之。特此辨明。）、《詩筏》、《騷筏》、《激書》，有《水田居文集》。¹

明代中後期，《詩經》研究漸由「經學」轉向「詩學」層面，開闢出《詩經》文學化的詮釋理路，並將晚明《詩經》的文學評點帶到前所未見之高潮。不久，明末興起經世致用之思潮，至清初聲勢更加浩大，於是《詩經》研究又讓清代考據學者所主宰，走向復古道路。²本文欲追問，明、清兩代《詩經》學有著相當顯著差異，而明清之際的《詩》學，呈現什麼樣貌？身處「天崩地裂」的文士或明遺民，如何承、啓這塊《詩》學史的環節？顯然仍有不少空間，可供開發與省思。限於筆力與篇幅，本文僅能尋繹此一時期代表性人物，為上述困惑提供些許啓示與線索。綜觀《四庫全書總目》，明遺民賀貽孫《詩觸》³毀譽參半，學界關注寥若晨星。⁴事實上，賀貽孫《詩》學正提供了不少想像與詮解之可能。

¹ 貽孫本事可見其文〈先妣龍宜人行述〉、〈季弟子家行述〉，《水田居文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208（臺北：莊嚴文化，1997.6），卷5，頁200-201；頁202-203。趙爾巽等撰：〈文苑一〉，《清史稿》：「賀貽孫，字子翼，永新人。……貽孫九歲能屬文。明季社事盛行，貽孫與萬茂先、陳士業、徐巨源、曾堯臣結社豫章。及明亡，遂不出。順治初，學使慕其名，特列貢榜，避不就。巡按御史笪重光欲舉應鴻博，書至，貽孫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實甚。吾將從此逝矣。」乃翦髮衣緇，結茅深山，無復能踪跡之者。晚年窮益甚。」（北京：中華書局，1998.1），卷484，頁3414-3415。

² 梁啟超論清代學術曾以「復古」概之，云：「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9），頁136。

³ 本文所用《詩觸》6卷，咸豐二年刻本，為裔孫賀鳴盛重編本《詩經觸義》。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江西巡撫採進本4卷，不同版本故也，特此說明。

⁴ 目前關於賀貽孫《詩》學研究，僅見周作人〈賀貽孫讀《詩》〉，《知堂書話》（臺北：百川書局，1989.12），費振剛、葉愛民著：〈賀貽孫《詩觸》研究〉，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8），頁453-468、陳國安〈論清初《詩經》學〉，《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11月，第6期，頁61-65。成果雖少，均有參考價值，其中以費振剛、葉愛民著：〈賀貽孫《詩觸》研究〉較為系統而深入，然而對於遺民背景與色彩，以及與三家《詩》等重要

本文從「遺民說經」角度切入，評述賀貽孫說《詩》主張、內容及方法，試圖呈現此一「鼎革」時代氛圍，明遺民《詩》論面貌與特色，凸顯《詩觸》之歷史定位。一管之見爾爾，惟望大方之家拓展其領域之相關考索，逐步解決上述諸般疑問，實是學林之幸。

一、賀貽孫的《詩》學主張

《詩觸》六卷，採逐篇講章與專題論文二部分構成。體例為《詩》篇原文之後，錄〈詩序〉首句，其次訓詁字義、典故以及鳥獸蟲魚等名物，再次講解詩意，串講字句，點明結構，闡發言外之意，偶見《詩》篇對讀，並與後人詩文作法比較，指點詩藝，意猶未盡則引謝枋得（1226-1289）、鍾惺（1574-1624）、萬時華（1590-1639）等人評語，增強己說。專論為〈國風論〉、〈周南召南論〉、〈二雅論〉、〈商頌論〉等 26 篇，卷末〈思無邪論〉歸結全書，經緯三百篇，儼然形成一有系統的闡釋體系。賀貽孫《詩》學主張，如採用〈詩序〉發端一語，詩三百皆樂章，正變之說等，大多前有所承，故舉其大端，見其值得注意處。

（一）三百篇皆樂章說

唐代以前，《詩三百》普遍被認為全是樂歌。疑經思潮下的宋代，開始對這一說法產生疑竇。程大昌（1123-1195）《詩論》首開其端。其後朱熹、焦竑（1540-1620）、甚至是顧炎武（1613-1682）均採這種說法。貽孫曾言：

今論《詩》者皆曰：「詩之為樂，不過〈雅〉、〈頌〉、〈二南〉而已，其十三國之詩，多出民間里巷，閨幃之言，是謂徒詩。不可以入樂也。」是不然。⁵

足見在清初以前，《詩》是部分入樂的論點，已廣為不少人所接受。然而，經過陳啓源（？-？）、馬瑞辰（1782-1853）、皮錫瑞（1850-1908）等清代學者的討論，傳統說法又漸被接受。直至近代學者顧頡剛（1893-1980）〈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詩》皆樂章的說法，已幾乎是定見。貽孫在清代是較早倡三百篇皆樂章之《詩》學家，儘管是隱居遺民，亦見價值。蓋貽孫所持理由略分為二，其一是將《詩》與民間歌謠區分為二：

夫十三〈國風〉之詩，雖出民間之言，而豈皆民間之用哉！采之諸侯，則諸侯

問題，作者並未觸及，以文學解經之特色，雖例證多而論述少，尚有補充、深入之空間。

⁵ 賀貽孫：〈國風論一〉，同註 3，卷 1，頁 487。

用之矣，獻之天子，則天子用之矣。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皆不可以入樂，以其所用者小也。⁶

貽孫將這些民間之「言」（否定有「樂」之功能與音樂性）分爲六類：歌、謠、謳、誦，有音無樂；語、諺，有聲無音。「詩」或從民間歌謠而來，具備聲、音，且諧於金石絲竹，協於干戚羽旄，而後有樂，施之於宮廷，顯情志，施教化，故與民歌有小大之別，關係脫鉤。其二，是《左傳》所載季札觀樂之事。貽孫云：

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使徒詩而不可以入樂，則何以皆謂之周樂？

7

入樂與否，爭議點主要在〈國風〉。「季札觀樂」是確定〈國風〉入樂相當有力的證據。貽孫提出三百篇皆樂章說，論證獲《四庫》館臣的基本肯定。然而，貽孫的三百篇皆樂章說，卻別出心裁。

貽孫將《詩》之入樂特性，與後世詩文比附，這個論點之提出是很有勇氣的，與其文學解《詩》的主張，亦有密切關係。貽孫云：

故夫《詩》之為樂，猶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也。⁸

這番「妄言」招致《四庫》館臣疵議，認為後代詩詞之曲調格律均與《詩》迥異，故謂「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⁹，頗不以為然。從官方學術傳統來看，形式上的比附並非嚴重缺失。蓋經書寓有恆常不變之道，集部詩文自然不比聖人立言，有其神聖性，且允許某種成分的想像、虛構。貽孫將經、集部地位拉得太近，似是不倫不類，所以不妥。

膽大之處，還在貽孫於〈二南〉末段細論《詩》之分章，託友人梅道人之口，與戲曲作法等而論之，表列如下：

⁶ 同前註。

⁷ 同前註。

⁸ 同前註，頁 488。

⁹ 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1），卷 17，頁 225。

《詩》分章結構	詩例篇目	今之曲調
首章同疊者	〈鹿鳴〉、〈君子于役〉、〈曹風〉等	前腔
末章同疊者	〈漢廣〉、〈北門〉等	合尾
首尾同疊者	〈麟趾〉、〈騶虞〉、〈黍離〉等	合唱
首章另一體製，後乃同疊	〈關雎〉、〈卷耳〉、〈行露〉等	引子
前數章同疊，後章另一體製	〈葛覃〉、〈采芣〉、〈靜女〉等	煞尾
首尾另一體製，中間數章同疊者	〈候人〉、〈雲漢〉等	起煞相應
單合相間 ¹⁰	〈伐木〉等	南北相間
前後單合，參差不齊	〈蓼莪〉、〈車攻〉、〈桑柔〉等	南北互用 曲白相生
全無同疊，單歌單吹不合樂	〈谷風〉、〈簡兮〉等	清唱

貽孫「觸類旁通」的作法，竟也擴大到俗文學，真是《詩》學史上之一大創舉，歷來恐難出其右。蓋《詩》有回環複沓的形式特色，竟類比於戲曲的曲調、手法，對正統文學是很大的挑戰。費正剛、葉愛民認為「這是與明後期市民意識的抬頭及俗文學的興盛相適應的」，¹¹從文學與社會的角度合理解釋這種現象。貽孫接受鍾惺《詩評》、萬時華《詩經偶箋》、戴君恩《讀風臆評》等文學解詩特色，可以更寬泛地鑑賞《詩》，增強了詩之況味，亦頗有一新耳目之感受。

（二）尊〈序〉首句，續序鑑別取之

貽孫受南宋程大昌影響為尊〈序〉派，朱熹《詩序辯說》亦本此，貽孫云：

昔者程大昌嘗引鄭玄釋〈南陔〉六詩之言曰：「六詩發序之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始分冠篇首，則鄭玄在漢，蓋嘗親見古序。」¹²

貽孫因循〈南陔〉六詩序發端語乃合編之說法，肯定程大昌之觀念，是可言《詩》者。〈南陔〉六詩序，惟存一語，故知最古，又於詩三百〈序〉，信奉發端首句，其〈凡例〉云：

¹⁰ 賀貽孫：「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磬輔，合歌則簫管竿簧皆輔也。不合樂處，大都皆單歌單吹，合樂處乃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而行，此又一體製。」詳見賀貽孫：〈召南〉末節評語，同註3，頁502。

¹¹ 詳見費振剛、葉愛民：〈賀貽孫《詩觸》研究〉，頁458。

¹² 賀貽孫：〈水田居詩觸凡例〉，同註3，頁486。

是編雖從〈序〉說，然以古序發端一語為正，自發端一語外，皆漢儒續增，原非古序，蓋毛衛輩所得於師說者，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余故斟酌從之。¹³

以為〈序〉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奧，於詩義有所得。首句之外，為漢儒所增，稱作「續序」，頗失〈序〉意。¹⁴按〈詩序〉僅取發端一語，由來已久，自北宋蘇轍、二程明確地指出後，程大昌進一步分析續序之誤，明代如郝敬（1558-1639）《毛詩原解》、朱鬱儀（1564-1624）《詩故》、張次仲（1589-1676）《待軒詩論》、朱朝瑛（1605-1670）《讀詩略記》等都有所繼承，顯然明代中期之後，尊〈序〉首句是一股相當流行的風氣。

須著眼的是雖取首句作法由來以久，貽孫又能看出續序有不可磨滅之價值，然須斟酌擇取，顯然較諸《詩》家融通、折衷。如〈小雅·小弁〉，〈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宋人以為宜臼遭逐，自作怨之，貽孫駁之。篇幅較長，刪節如下：

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慝負罪之不遑，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豈非高子所謂小人之詩哉。……太子以有罪而廢，傅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傅之責也。為宜臼傅者，既不容己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託為宜臼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無以踰此。……高子所謂小人之詩，罪其人而并及其詩，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愛其詩而置其人於不論，則是以〈小弁〉之怨，非宜臼之言，而其傅之言也。吾故曰：「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知有不可廢者。」¹⁵

貽孫乃從孟子論〈小弁〉語而發。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均不孝也，故怨慕之情辭，有所發與不發。無罪被廢，宜臼難言，太傅有責代為言之，明其仁孝之道，骨肉之情，此乃古人教化之微，諷諫之深，若從朱子等人以為宜臼自怨之作，則淺訛矣。

此處尚可追問，部分續序得存是貽孫認為毛、衛等漢儒增衍較好嗎？貽孫的理解給予

¹³ 同前註。

¹⁴ 如詮解〈東門之池〉云：「序曰：『刺時』，其為淫風可知矣。漢人續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蓋泥「淑姬」二字，遂失〈序〉意。」按此詩〈序〉確有不妥。朱《傳》云：「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以男女約會於東門城池釋之，是為簡當，不必務求深意。王師靜芝《詩經通釋》以為此說過迂，全詩既未見昏君之義，且淫昏應是思賢臣，何以思賢女？詩應本無諷刺之言，序詩者推衍教化之義，故序詩者之刺，非作詩者之刺。以上三處引文，參看賀貽孫：《詩觸》，卷2，頁555。〔南宋〕朱熹：《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78.10），卷7，頁82。王師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2001.10），頁283。

¹⁵ 賀貽孫：〈小雅·小弁〉，同註3，卷4，頁603。

後人思考空間，其釋〈小雅·六月〉云：

凡諸續序義隘而偏，辭澀而拙，殊不似先秦人語，獨此序與〈東山〉篇續語則辭義俱達，若皆如此，即以為子夏所作，誰敢疑之？大約續序非盡無其本，因漢之講師謬為附益，遂真偽混淆耳。¹⁶

貽孫認為，續序又有二脈，一是毛衛輩增衍之「偏辭」，是「偽序」；其二是「真序」，逕合古序，語辭古質而不澀者。續序中的真序，雖非與古序同時形成，卻是有本而續，故不可廢。是知「續序」若就「古序」加以詮釋，有助詩意瞭解，則有存在價值，不宜偏廢，但若見過度詮釋者，則尊〈古序〉即可。又，其甄別真假的去取標準，唯依是否符合「微而諫」的教化作用。因此，續序參雜真偽，又與古序混淆，貽孫一尊古序為是，其意在此。這種折中門戶，間採漢儒諸說之兼容作法，補充〈古序〉微言深義，對於詩意探求頗有參考價值，故《四庫全書總目》評云：

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¹⁷

不主一家，專意探求《詩》古義的作法，恰好合於四庫館臣打破門戶拘見，尊孟子以意逆志的治學觀念，其讚賞《詩觸》之處，確是的評。

（三）對朱熹《詩集傳》態度：美刺與淫詩之爭議

自元明科舉條制流行，《詩》概以朱《傳》為準，¹⁸中晚明漸有修正、反撥朱說之聲音。儘管如此，《詩》家批評詮說，仍多以朱《傳》為基礎，而見其異同，難以完全省略不談。貽孫論《詩》，重視言外之意，推求深意，故多折衷諸家，不屬輔翼朱子者，亦非反朱子一派，然去取皆致其由，非臆度之《詩》家。

貽孫對朱《傳》態度，首先可見於《詩觸·凡例》：

¹⁶ 同前註，〈小雅·六月〉，卷3，頁583。

¹⁷ 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同註9，卷17，頁225。

¹⁸ 皮錫瑞在《經學積衰時代》云：「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一統時代。」見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7），頁203-204。又《四庫全書總目》云：「有元一代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頁202。均見朱《傳》為科考底本，及其在兩代《詩經》學的影響力。

考亭疑毛鄭，並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淫奔，多失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以互相發明。¹⁹

朱《傳》不錄〈詩序〉，只加自己解題。懷疑〈詩序〉處，亦遍及〈風〉、〈雅〉、〈頌〉，對尊奉〈古序〉的貽孫而言，朱《傳》曲解詩意甚多，故於朱註則多所取捨，並未篇篇徵引，惟佳處存錄，害意處亦載之批判，斥為「偏辭」。

貽孫對朱熹較多採用處，在於字義詮解，如〈邶風·終風〉「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朱《傳》：「暴，疾也」²⁰貽孫云：

朱註云莊公為人狂盪暴疾，以疾字著暴字，於〈終風〉之義甚切，疾，猶言輕躁也，今人謂輕躁者曰暴子，曰風子，即同此意。時解以為暴虐之暴，殊非閨閣間口吻。²¹

此處贊同朱註，並加以說明合情理之處，使人信服。但對於朱子《詩》義發揮則相當謹慎，尤其反對朱熹淫詩說，以為《詩》旨不必處處牽合男女閨閣之情。因此，相較〈雅〉、〈頌〉，認為朱熹解〈風〉問題較大。《詩觸》有一篇專題論文〈國風論三〉，針對朱子解〈風〉詩而發：

朱文公疑〈小序〉所云「刺詩」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害溫柔敦厚之旨，遂盡坐以淫奔。如〈將仲子〉刺莊公也，而疑逾牆為私約；〈子衿〉刺學校廢也，而疑佻達為風情；〈有女同車〉刺忽也，而疑舜華為妖冶。諸如此類，不可勝舉。²²

貽孫以為朱熹淫詩說，是未深「刺」義。以下犯上，失其綱常，故朱熹否定「刺詩」，以淫奔之作視之。貽孫認為「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同樣有害詩教，譏朱熹之作法是「惡鉤吻之傷人，而欲易之以鳥喙也」²³，直指作法是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四庫全書總目》

¹⁹ 賀貽孫：〈凡例〉，同註3，頁486。

²⁰ 〔宋〕朱熹集注：〈邶風·終風〉，《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78.10），卷2，頁18。

²¹ 賀貽孫：〈邶風·終風〉，同註3，卷1，頁507。

²² 同前註，〈國風論三〉，卷1，頁491。

²³ 賀貽孫在〈國風論三〉簡扼有力地反駁朱熹看法：「文公之意，蓋以鄭衛所謂桑間、濮上，淫聲也。夫子嘗謂鄭聲淫矣，但所謂鄭聲淫者，謂其聲音淫濫，如江河之水泛泛然無所底止，故曰鄭聲好濫淫志，非謂鄭衛諸詩所言皆男女淫奔之事也。且文公既慮輕浮險薄之足以害教，而不思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是猶惡鉤吻之傷人，而欲易之以鳥喙也。」同前註。

認為《詩觸》：

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²⁴

貽孫對朱《傳》之棄取，參之《詩觸·凡例》之因由，與實際解經情形的觀察，館臣之見頗為合理。換言之，攸關詩旨者，貽孫則以〈序〉之首句，輔以美刺詩教，曲求言外之意；於詩旨較為無礙的文句釋義，則遵之朱《傳》。

又，如何釋「刺」？貽孫首先確立《詩》教之對象，乃為「中人」²⁵而作。蓋上者非待《詩》而後勸；下者非《詩》而能懲，故美刺生焉，可使民思歸之於無邪。但今人之美刺，不同於古人美刺，不必以怒罵為刺，如「〈簡兮〉但自譽而已，〈考槃〉但自寬而已，而棄賢之失已彰」²⁶，或「其人不能諱者，則指其人之地以醜之，〈新臺〉、〈株林〉」²⁷等情況，均與今人以諂媚為美，怒罵為刺的觀念迥異，惟詞微旨遠的《詩》能如是哉！含蓄蘊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

從朱熹、貽孫之《詩》學對顯可見，貽孫《詩》學基調並非曲微難懂，原則清楚，立場鮮明，對於注疏家之見解，違則正之，合則贊之，不主一家，或有折衷〈詩序〉、朱子之說。溯其思路，大旨以孔子「思無邪」一語貫其體系，故反對淫詩之說，肯定美刺教化。然而，刺詩含蓄隱微，淫者自恥，對朱子廢刺詩之舉不以為然。貽孫又以為美詩可刺，刺詩未必非美，同一首詩可以因應場合、對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刺變化，貽孫看出了《左傳》賦《詩》有斷章取義的現象，站在《詩》的實用立場理解其變通。因此，推求《詩》旨，不必從字句訓詁推敲而來，淺求而深意自現，深求義則淺陋，後者亦是貽孫對漢儒反感之處。順言之，反映在詩學上，含蓄蘊藉的藝術手法，自然是他一再強調的，後文有所申述。

二、《詩觸》的遺民色彩

貽孫終身入山遁世，不僅是遺民，亦是逸民。他不循易堂九子結廬以結交天下豪傑之

²⁴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同註9，卷17，頁225。

²⁵ 賀貽孫〈思無邪論〉從鄭聲淫談到《詩》的讀者問題，其云：「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諷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烏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思而無思也，無思之思，此固邪正二途之所不涉者矣，然聖人不以是立教也，聖人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為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同註3，卷6，頁700。

²⁶ 同註3，卷1，頁491。

²⁷ 同前註。

路徑，選擇獨善其身，著書立說。清朝廷續了他的生存舞臺，轉變其表演方式，《詩觸》亦因此沾染了獨特的政治色彩與遺民精神。

（一）詩教風化—匡時淑世之精神

貽孫謂《詩》三百皆樂章，強調美刺作用等詮解主張，可以看出他重視風教，匡時經世之思，未隨明亡而消失，反而表現遺民的社會責任感。儘管貽孫沒有如宋遺民謝枋得《詩傳注疏》的激切之辭，但因清兵初入，殘暴傷民，「偕母入山，觀閔受侮，饑寒流離」²⁸的生活經歷，也有自胸臆流出的悲悽之慟。貽孫讀〈柏舟〉，便觸發感觸：

我所憂者，皆群小之故，而此時群小，反含慍以待我，翻似我得過於彼者，然由是讒毀集，而我之觀閔於群小者多矣；由是欺凌生，而我之受侮於群小者不少矣。觀閔，猶可堪也。受侮，不可堪也。此四句，非親歷此苦者，不知其言之沉痛。²⁹

貽孫緊扣經文注疏，高度刻劃主角內心糾結，細膩之程度，其他《詩》家難出其右，可以強烈感受到貽孫揮灑自我的色彩。自述「觀閔受侮」，明顯摘用於〈柏舟〉，而觀「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這番喟歎感發，雖未必與〈先妣龍宜人行述〉逃奔山林之事吻合，卻有移情作用。顯然，貽孫過去難堪受辱的遭遇，仍難平復，遂將自身情感投射《詩》中。

淒慘際遇並未擊潰貽孫，反而發憤著述，以立言不朽彰顯其志，如〈周頌·清廟〉云：「凡此皆文德之所感者，而豈不光顯承順乎？信乎？文王之德沒世不忘，而無厭於人心矣！」對現實的期待，轉向對文王盛德之企慕。此外，亦可見其對人臣之諫：

用人則不得其平，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則尹氏亦非巨奸大慝，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遂至於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為權臣千古龜鑑矣。³⁰

²⁸ 賀貽孫〈先妣龍宜人行述〉：「昔年壬午，秋場不售，貽孫年三十有八，見天下大亂，已厭棄舉業矣。甲申燕京陷，乙酉江右繼陷，欲入山肥遯，而憂三釜之養不逮也，泣而告母，母曰：『汝勿憂，吾昔在汝父官舍，身處脂膏且不自潤，況今日乎？汝能守志，巖棲泉飲，與汝同之，但初終勿變而已。』貽孫受教唯唯。遂偕母入山，觀閔受侮，饑寒流離，母談笑如平日。」極見其母忠孝節義之高潔，影響貽孫甚深。見賀貽孫，《水田居文集》，同註3，卷5，頁200。

²⁹ 賀貽孫：〈邶風·柏舟〉，同註3，卷1，頁505。

³⁰ 同前註，〈小雅·節南山〉，卷4，頁595。

權臣雖非惡徒，但瀆職則誤國害民，貽害甚深，貽孫特此揭明誠之。

貽孫也常一本人情之善以說《詩》，如解〈魏風·碩鼠〉：「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絕，此則民情之厚也。」³¹又如解〈周南·汝墳〉「父母二字，親暱之極，尊重如方伯，而汝墳之婦人，得以父母親之，王政蕩蕩，王民熙熙，即此可見」³²，皆見收風人之效。

顯然，貽孫雖不作貳臣，仍相當關懷君王政治與人倫教化等世事，士人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和忠厚情性，都在《詩觸》觸類旁通，會心解頤的作法中，被彰顯出來。

（二）隱遯保真——個人生命擇取

王國維論清代學術史嬗變，透露出學術轉變關鍵，與一種特殊身分息息相關：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率多勝國遺老，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³³

王氏指顧炎武等「勝國遺老」的治學方法，開清初經世學風之先。這段話可以省思之處在於：遺民經說，是學術史上一個比較寂寥的議題，卻相當值得重視。

中國歷代以降，分合不斷，前朝遺民亦不可勝數，且多有著述。尤其遺民經歷國變之慟，面對儒家淑世精神所產生的心理矛盾，在「仕」與「隱」間如何取捨？又若詮解六經者，則透顯出何種內容思想？對於之後的士人的學術走向，產生哪些影響？但，只有這樣的認知仍顯粗泛，遺民雖入新朝，卻各有際遇志趣。前朝宦途順逆與否，以及易代之後，為僧、為道、隱逸山林，或講學書院，或激烈抗爭者，都影響著書「心態」與「內容」，凸顯出遺民共性底下的多元個性。國變之後，歷經饑寒流離，選擇歸隱山林以終老的賀貽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說《詩》家。

貽孫乃屬獨善其身的遺民類型，其情志清楚顯現在友人書信中。同為隱居著述的明遺民陳孝逸在〈寄賀子翼〉有「第屬子翼，吾愛吾廬，須履幽人之貞，勿為蒼生而出也。生為百夫雄，死作壯士規，亦何妨與古隱君子鴻飛天漢，而乃宛轉鶯雀間耶？」³⁴此處用王粲〈詠史詩〉「生為百夫雄，死作壯士規」典故，表達節義精神，讚賞瀟灑山林的隱士人格，有其新變意義。此外，與魏禧同屬「易堂九子」的彭士望（1610-1683），與貽孫曾有

³¹ 同前註，〈魏風·碩鼠〉，卷2，頁542。

³² 同前註，〈周南·汝墳〉，卷1，頁497。

³³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收錄於《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頁720。

³⁴ 陳孝逸：〈寄賀子翼〉，《癡山集》（清初刻本），卷6。本文乃檢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交遊，則勉勵貽孫，雖潔身自了，不可忘卻天下：

（曾堯臣）同郡獨推子翼，每為弟私之謂「是素樸人」。今翁兄操行無玷，鄉里始終，固不愧其言，亦足名高士于後世。而弟愚謬，竊妄謂士所當為，未只于此，……痛定思痛，即偷活草間，不徒以獨善自畫，其于世教人才，民生國恤，須以為饑渴性命，磨勵講求，歸之實用。手之所觸，足之所履，心背之所遊行出沒，無時不俱，隨力自盡，即不能見之行事，亦當託之于書，散之于人，寄其薪盡火傳之志。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死而後已者也，豈得以老為辭哉！³⁵

彭士望熱衷經世實學，廣交豪傑文士，既然高度肯定貽孫之才學識見，對於貽孫隱沒一方，遂而深感可惜。蓋貽孫留有大量論政文章，亦有匡時救世之《激書》，³⁶實非彭士望所謂偷活草間之人，當是未見其著述使然。然而，貽孫立身行事，宛如山中樵夫或隱者，卻也屬實。

貽孫這種思想其實也間出於《詩觸》。雖然解《詩》多著意德行教化，亦善於揣摩詩人情感，但字裡行間卻有潛身藏才的老莊思想，甚至流露出對隱士的嚮往。如釋〈邶風·雄雉〉末章「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云：

大凡自詒伊戚之人，患在每事自以為臧，自以為臧，即忮求之根也。惟以不忮不求之心處之，則所用者無不臧矣。豈獨行役軍旅之間哉？閨閣中語，平實無奇，須久處艱危，方知此言受用不盡。³⁷

貽孫不僅僅是發揮詩義，而是抒發心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為安身立命之道，由「久處艱危」二句，知乃貽孫國變經歷，總結歷史教訓之感受，所標榜淡泊無求的處世態度，亦更內斂消極。如，貽孫評〈小雅·正月〉「執我仇仇」，解《經》之外，令人格外想其內心唏噓：

「執我仇仇」，如檻中之鹿，籠中之雉，無復長林茂草之樂，此時即欲求退而有

³⁵ 彭士望：〈與賀子翼書〉，《耻躬堂詩文鈔》（清咸豐二年刻本），卷2。本文乃檢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³⁶ 詳見賀貽孫：《激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94（臺南：莊嚴文化，1995）。

³⁷ 賀貽孫：〈邶風·雄雉〉，同註3，卷1，頁509。

所不能矣。然則當亂世而使人掛冠而隱者，不可謂非偉事。³⁸

按此為詩人自傷不幸，怨天尤人至極之辭，走此思緒，無暇想及隱居之事。顯然，貽孫心有所感，藉〈正月〉道出對亂世之厭倦，獨身求隱的無奈，自為慨歎之語，蓋生逢明亡離亂之世，既不願事二君，惟避走山林，獨善其身為宜。

對隱士的嚮往，也反映出他對道家無為而治的推崇，其解〈王風·兔爰〉：

天下事為者敗之，我生之初，無為、無造、無庸，故周室雖弱，而天下晏然，及其亂也，多為、多造、多庸，而國非其國矣。曰百罹、曰百憂、曰百凶，言其多也。善治天下者，寂然若無事，不善治者，擾而至于多事，多事則多罹矣。其始以多為敗之，其卒也，遂至於不可為，蓋欲求為昔日之弱，而不可得矣。

39

貽孫以為國家敗亂至此，病入膏肓，走向滅亡乃遲早事，可見總結歷史教訓之深意，然其政治論述，無關儒家仁愛禮義之道，卻與老莊抱樸篤實，潛聰明，去巧用的主張相謀合。這個現象可以從其思想著作《激書》得到正確的印證，如〈藏用〉提出藏用吾才觀念，〈戒智〉反對巧智算計，〈存真〉倡莊子逍遙，與物俱化等觀點，皆能看出他對安時處順的社會之企求。

貽孫作為隱逸山林的遺民類型，卻未反映出對國家亂亡的激憤之辭。而是經歷國變之慟，擇取安身立命，獨善其身的道路。《詩觸》特別之處，在一方面對於儒家人倫教化、興亡盛衰之道，多有著墨；另一方面，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反而流露出道家無為無爭的人生觀，有較為出世的思考，平添些許儒、道互滲的解《詩》色彩。貽孫詮解〈山有樞〉，其中一段饒富興味，如同自述經歷一般真切：

各末二句，哀音繚繞，大似〈蒿里〉〈薤露〉諸曲，蓋以勞生之人，強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之想，迫為達生之語，宜其寄意淒婉，刺人心脾也。

40

我所憂者，皆他人之愉；我所保者，皆代他人保，最傷心者乃「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³⁸ 同前註，〈小雅·正月〉，卷4，頁596-597。

³⁹ 同前註，〈王風·兔爰〉，卷1，頁526。

⁴⁰ 同前註，〈唐風·山有樞〉，卷2，頁545。

不正是貽孫在國亡治亂下的真實寫照。勞生、強作樂生、憂生、迫為達生，這番心路轉折過程肖似貽孫。或許，看似通達、透脫，獨善藏身的生存方式，在《詩觸》字句含情的筆觸之下，含蘊了作者極為深沉的悲慨。

此外，尚可注意稍晚於貽孫的大儒王夫之（1619-1692）。其《詩廣傳》除了表現王夫之本人的《詩》學立場外，包括遺民思想、政治思想，或詩本性情、情景交融的文學觀念，都有所發揮，學界已有相當定見，⁴¹而其關注角度可說是順著貽孫門徑而擴大、揮灑，雖然廣泛博雜，但兩者仍有可比性。不過，與王夫之憤慨、氣結的遺民思想相較，通覽貽孫《詩觸》，卻有低迴、悲淒之氛圍。雖然目前史料尚未見二者關聯，但以《詩》為闡釋自己思想觀點的風格，不惟在活躍的王夫之身上可以找到，隱遁山林，不問世事的賀貽孫亦得見之，反而說明了清初《詩》學特有的開展、轉變現象，也約略透露了明代各種遺民類型的展示。

三、《詩觸》文學解經之特色

作為遺民，必然帶有前代學術思想的色彩或影響。貽孫解《詩》受到中晚明興盛起來的評點派的影響相當顯著，展現著思想自由的學風。以詩文批註解《詩》，包括讀詩、論詩、釋詩和評詩，都受到鍾惺、萬時華等人深刻的影響，於《詩觸》中亦不時引用之，這種用文學手法解《詩》的文學觀，除了因為他們同時還具有詩人、詩評家身分，認為詩之為經，亦視為詩，是文學批評之範疇。其次，貽孫則是從「解經」的立場延伸開展的，實踐以文說經、解經的詮解方式，跳脫傳統經學一貫的思維模式。因此，明清之際遺民大儒的學術著作，相較於清代儒士，多少都帶有些文學眼光。遺民說經有多元面向，賀貽孫作為明遺民，保留著晚明學風，以文學解經，呈現出相當典型的形象。

（一）詩文對讀，凸顯文學特色

《四庫全書總目》曾批評《詩觸》「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卻未注意到貽孫《詩》篇對讀兼通的解詩方式，這是相當醒目而獨特的。

貽孫論《詩》，喜歡從「比較」中看出「特色」，為學術研究之妙法。貽孫一則將相同

⁴¹ 如戴維先生《詩經研究史》提到：「《詩廣傳》是王夫之利用《詩經》引申發揮他的哲學、政治、歷史等觀點的著述，於詩義、訓詁極少論述，所以叫做廣傳。《詩廣傳》同時也是王夫之“新義理”思想在《詩經》上的結果。」（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9），頁484。又如趙沛霖先生所言：「書中有相當多的篇幅僅是以《詩經》為引子，闡述其學術觀點」，並指出該書由《詩》引申出哲學、宗教、歷史、政治、倫理道德、語言藝術觀點等。收錄於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8），頁189。

或相近主題之詩篇，比較對讀其詩義、藝術技巧及情感等，供讀者參考、會通。另一方面，與後世詩文對照，從今人創作宗旨或意境融會貫通古《詩》，達到「以意逆志」的效果。首先看〈小雅·四牡〉：

此詩與〈鵲羽〉篇同意，但〈鵲羽〉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為哀怨；此出於勞使臣之言，則為體恤耳，惟其體恤，故能周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豈不懷歸。」又曰「王事靡盬。」忠孝備，恩義兼矣。⁴²

二篇同意，口吻不同，所以感發人心的程度相異。在貽孫眼中，三百篇並非各自獨立成篇，是可以互相溝通，彰顯彼此詩意。對讀者而言，讀《詩》自然更能掌握重點、要旨，事半功倍。

其次，有與《詩》以外之詩文對比。如〈陟岵〉舉王維詩證之：

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人詩中已踞最勝矣。⁴³

此處不但對讀，亦比較詩學作法之高下，摘出「嗟」字低迴宛轉的特性，較直說「思」字更為淒涼有味。貽孫將《詩》與唐詩並列比較，呈現出一種詩學觀念：《詩》的地位雖然崇高，然非高高在上，後代詩文作品乃可以《詩》為創作典範，而且是能夠繼承的，有企及的可能性。

《詩觸》亦可見與《楚辭》對讀之例，產生對話可能。見〈北山〉：

然其妙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甚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劃，似讚似羨，以志不平。……《楚辭·卜居》篇亦將忠佞二意演為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比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⁴⁴

除通《詩》外，貽孫亦精《楚辭》，有批評專書《騷筏》傳世。此處會通《詩》、《楚辭》，絕非隨意漫批，實有其根柢。此處將詩人怨歎傷嗟之情與藝術手法的相似處，包括兩義並

⁴² 同註3，〈小雅·四牡〉，卷3，頁574。

⁴³ 同註3，〈魏風·陟岵〉，卷2，頁571。

⁴⁴ 同註3，〈小雅·北山〉，卷4，頁611。

舉，獨彰其一，以爲不平之鳴和敷衍句意的作法，足見貽孫運用經籍之純熟，造詣之高。

貽孫又有與「古文」相通者，頗有詩、文會通之意味。如解〈小雅·無羊〉云：

羊之和，於角見之；牛之安，於耳見之。言其安且和，則牛羊之盛可知矣。角
濺耳濕，已具畫意，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形體，并其性情而形容
之矣。韓退之〈畫記〉一篇，皆從此三句脫出。⁴⁵

貽孫當指〈畫記〉當中，韓愈對馬「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
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
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各種
姿態的生動描摩，確實可以看出《詩》對韓愈創作的影響。

饒有趣味之處，還在與書畫藝術相通者，試看〈周南·芣苢〉：

懷衽宜男之物，婦人采之。采之何為？采者不言，作者亦不能代言其故，但見
一團和藹之氣，溢於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此
何與后妃？政在閑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⁴⁶

「淡淡數筆」指出鍊字甚精之妙。此詩營造出風和日麗，婦人三三兩兩嬉戲吟唱的平野景
象，貽孫以遊春圖喻之，亦將此平和歡愉的氣氛生動地表達出來。又如〈宛丘〉：

全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⁴⁷

圖、贊實況已難考見，然而，貽孫看出它們風格和營構藝術境界相同，雖然將《詩》篇與
後代山水畫參看，行徑顯得大膽，但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⁴⁸像這般《詩》、畫會通的
觀念，在《詩》學史上實屬罕見。

由解經到賞文，貽孫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彼此互涉，務使讀者對《詩》義和
作法觸類旁通。此外，視《詩》爲「文學」典範之作，故與後世詩文遂有溝通交流之可能，

⁴⁵ 同前註，〈小雅·無羊〉，卷4，頁592-593。

⁴⁶ 同前註，〈周南·芣苢〉，卷1，頁496。

⁴⁷ 同前註，〈陳風·宛丘〉，卷2，頁554。

⁴⁸ 關於中國詩、畫互滲會通的文學觀念，可以參考錢鍾書先生：〈中國詩與中國畫〉，收錄於《錢鍾書
論學文選》（廣州：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6），頁1-32。

亦是反映貽孫由經學連接、延伸到文學的觀念。又《詩》之微旨，精妙手法，難以言說，以詩文讀《詩》，顯然較以理論《詩》，來得易於融通。貽孫於〈凡例〉釋《詩觸》之讀法，正是希望達到從文學鑑賞以通《詩》的效果：

以為可與漢唐以後詩人觸類旁通，故名曰：「詩觸」，若謂會心解頤，則吾豈敢。

49

觀之，必須承認非博涉群書又鑑賞力極高者，難以駕馭這種解經方法。《詩觸》所應有的價值由此凸顯，已不待言。

（二）重視《詩》之含蓄蘊藉，涵泳詩意

此一文學觀念，雖是直承孫鑛、鍾惺評點《詩經》方法而來，但與貽孫解《詩》重視微而諫的教化主張有密切關係，是由《詩》學過渡到文學觀念。含蓄蘊藉貴在涵泳詩的言外之意。因此，反對字句訓詁來推求《詩》義。漢儒求解《詩》，往往詳加訓詁，務求一字一義之通解，則未免拘泥文辭，貽孫甚至以「訓詁呆講，真堪發笑」等評語嘲諷之，書中屢見不鮮，蓋以為如此反而曲解原意，有違詩教，求諸貽孫目的，是避免過度詮釋的危機，如其評〈卷耳〉，漢儒當實事考證，他認為是虛景手法：

說詩之家，拘文牽義，莫甚於此篇，謂以后妃之尊，手持竹器，親采蒼耳，已不經矣，又況乘馬，命僕登山飲酒，……人馬俱疲，遊宴方休。此愚俗婦人，稍知自好者所不為，而謂開國聖母為之乎？……皆必無之事，憑空設想。⁵⁰

貽孫甚斥漢人曲附后妃之德，又以為據此解《詩》則矛盾自見，遂謂此乃婦人自設思夫之辭。這種跳脫后妃、夫人之殼，著眼涵泳詩意之作法，《詩》學史上相當罕見，與後來清中葉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清末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連成一脈，雖非立派，卻是清代《詩》學一支伏流，詮解方法不致斷絕，值得特別重視與關注。⁵¹

⁴⁹ 賀貽孫：〈水田居詩觸凡例〉，同註3，頁486。

⁵⁰ 賀貽孫：〈周南·卷耳〉，同註3，卷1，頁494。

⁵¹ 戴維先生認為：「清代說詩，有一非派別的派別，其力圖掙脫經學牢籠，跳出時代的局限，專事涵詠詩文，就詩以論詩，在清代有姚際恆發其軀，清中期有崔述繼其武，而清代後期，則有方玉潤踵其後，使這一野狐禪說詩派脈線不至絕斷，在《詩經》學上放一奇葩。」見《詩經研究史》，頁595。《詩觸》雖不若方氏能完全拋卻〈詩序〉，但亦視作一部文學作品來讀，減少甚多經學束縛，別開新視角，亦是這一「非派別」派的主要特色，雖與清代以經解《詩》之學風對比，相對落寞，但對民國以來治《詩》風氣影響很大。

又如評〈盧令〉：「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⁵²此處設想了言未盡而語忽收，情味悠深的審美感受。故「無字無句」之訣，看似懵懂費解，其實正是要讀者不必強求索解，只需反覆涵泳，言外之意，遂而可通。

貽孫解詩，又涉及「言、意」之辨。蓋詩家貴在以象傳意，而非言以盡意，故最忌直敘。若道破無遺，實落入淺陋，故在〈猗嗟〉有段趣語可思索之：

則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必鑿破，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大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其可說者皆非詩也。⁵³

這種觀念也反映於他文藝鑑賞的態度，如評〈鹿鳴〉云「大抵詩人之語，深求反淺，淺看自深。」⁵⁴這是說明讀詩強解之弊。又評〈螽斯〉云：「〈樛木〉之篇，三祝福履，至〈螽斯〉則無所用祝也，但見爲宜然而已。蓋感激祝頌之意，至此愈深矣，其立言之妙，全在不露正意。」⁵⁵詩文之可思可見，在於含蓄映帶，留讀者想像閱讀空間，反較直說有味。《詩》之尤然，重章疊唱之短篇形式，正在字句精鍊處，顯其跌宕或層遞，饒富深意。若從詩教來看，美刺微旨藉其比興手法之傳達，作者未必道破，讀者卻已不忍聞見，或不言自愧，亦貽孫《詩》學一貫的欣賞態度及主張。

（三）虛設想像的文學效果

貽孫推崇以情入詩，他相當肯定人的性靈、真情。《詩筏》云：

今人貶剝《詩歸》，尋毛燬骨，不遺餘力。以余平心而論之，諸家評詩，皆取聲譽，惟鍾、譚所選，特標性靈。……掃蕩腐穢，其功自不可誣。⁵⁶

文學想像是相當感性的思維模式，通過情景的感受，體會箇中詩境情味，是文人性靈的展現，他在《詩》中也時常提出這個觀念，立〈葛生〉爲「古今閨怨第一」，強調虛設懸想的效果：

⁵² 同註3，〈齊風·盧令〉，卷2，頁538。

⁵³ 同前註，〈齊風·猗嗟〉，卷2，頁539。

⁵⁴ 同前註，〈小雅·鹿鳴〉，卷3，頁574。

⁵⁵ 同前註，〈周南·螽斯〉，卷1，頁495。

⁵⁶ 賀貽孫：《詩筏》，收錄於郭紹虞主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頁197。

「予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絮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涼閨寂，又甚於獨寐矣。⁵⁷

景物常在，何人與共？屋飾愈是光彩美麗，愈是凸顯內心的孤寂淒涼。景物因與人的接觸而被主觀化，並將回憶同歡共聚的斷片呈現出來，具有凝聚兩人之間情感的力量，於是，就在不斷地沉浸過去與回到現實之間，反覆迴旋、碰撞，而湧生更加沉痛之哀傷。貽孫就是掌握《詩》中這種「睹物思人」的寫作模式，鼓勵創作要大膽「想像」，透過想像所營構的意境，遂能細膩地表現幽微婉曲的情思，獲得強烈的藝術效果。又如〈竹竿〉，以為通篇虛景：

詩中皆憑空設想，忽而至衛，忽而垂釣，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而巧笑，與波光相媚，忽而佩聲，與舟楫相聞，思力所結，恍若夢寐，妙甚妙甚！⁵⁸

此評宛如自鍾惺、萬時華等人口中說出，以寥寥數語表達對作者創意構思的讚賞。想像的目的，就是組織並改造詩人的生活經驗，營造一個典型環境，能比現實生活，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藝術真實。逼出讀者性靈，反對生硬剽竊，是貽孫詩學觀念。他透過《詩觸》開展了由《詩》到文的創作啟發，重視虛實手法，並活用人們可貴的想像力。想像是人類一種靈性活動，出自於性情之真，引領讀者進入藝術真實的情境，一切意象皆橫於胸中，詩句由此變得靈動神妙。王夫之讚部分《詩》篇有情景交融，達到「妙合無垠」之高度，其一即是針對設作遙想之取景而發。

顯然，貽孫已從詩人心靈來觸碰《詩經》，略有離經叛道的味道，因此與晚明評點派的《詩》家同遭《四庫》館臣的譏諷，亦是料想之事。然而，貽孫之所以從文學解《詩》，求之觸類旁通，費正剛、葉愛民推測是「在主觀上作者是想找到文學在聖賢經典中的存在來挽救越來越遠離大眾的經學」⁵⁹，或與文學的大眾化、世俗化有關，但回歸學術思想的層面來看，相較於諸儒詁經的拘腐、教條化，貽孫對人類性靈的珍視，創作力的可貴，或是更為直接的動機。《詩觸》無疑是《詩》經學史中少數具有鮮活情味的產物與異端。

⁵⁷ 賀貽孫：〈唐風·葛生〉，同註3，卷2，頁547。

⁵⁸ 同前註，〈衛風〉，卷1，頁523。

⁵⁹ 費振剛、葉愛民著：〈賀貽孫《詩觸》研究〉，頁466。

四、餘論：《詩觸》用〈詩序〉問題

〈詩序〉問題，乃《詩》學史聚訟公案，歷來學者皆出入於尊、廢之間，難以據斷。貽孫雖尊〈詩序〉發端一語者，言之成理，然亦有可商榷處，本節欲從《詩觸》所據論點與時代角度，試觀論證闕失。

《詩》本義為何，事實上已難斷定，包括《左傳》、《漢書》、《列女傳》、《易林》、《說苑》等先秦兩漢典籍引《詩》賦《詩》之文獻，雖是貼近古義，然斷章取義，歸於實用，仍極可能非原來《詩》旨。貽孫太尊所謂的〈古序〉，意有未安，未必真切。如〈衡門〉有爲〈古序〉強解之嫌：

此隱者詩也，而〈序〉曰「誘僖公」，何也？漢儒云「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於僖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愿主無事外求，故曰「誘」也。⁶⁰

此詩乃指賢者不用事而隱居，貽孫亦同意此說，然豈可以誘君隱逸？以《詩》證〈序〉，貽孫亦頗難「解人頤」，竟依他所不信任的漢儒續序爲之補白，似有違凡例，解說也顯得牽強。

此外，他對三家詩的態度，也可以看出《詩觸》太尊古序的闕失。貽孫《詩觸》不管是篇次、解題，完全依《毛傳》、鄭《箋》、朱《傳》而批評，並未重視三家詩。事實上，在清《詩》學對三家《詩》輯佚取得豐碩成果之前，明代已經可見關於三家《詩》的零星輯佚文獻，貽孫並非沒有注意到三家《詩》，釋〈周南·關雎〉時云：

關雎所以美后妃也。然歐陽永叔云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又漢儒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帝紀論》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後之疑〈小序〉與《毛傳》者，以此爲辨端，不知〈古序〉一也，所謂齊、魯、韓三家不過訓詁、箋釋，略有異同耳，豈能於〈古序〉外，別爲說哉？⁶¹

按貽孫視三家《詩》與《毛詩》異文異字的現象，僅訓詁上的不同，實同一古序，故於《詩》義闡發並無不同。然而，事實上，三家《詩》有不少義旨發揮，與《毛詩》不同，如〈采芣

⁶⁰ 同註3，〈陳風·衡門〉，卷2，頁555。

⁶¹ 同註3，〈周南·關雎〉，卷1，頁493。

苕》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韓、魯皆作「夫有惡疾」⁶²解，尤其《列女傳·貞順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⁶³魏源《詩古微》云：

《國語》文王即位，諏于蔡、原。韋昭以為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春秋》蔡班先衛，宋爵先陳。而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猶燕申無風，得《甘棠》、《行露》補之。陶宏景《別錄》云：「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正足徵韓義之確，且與《漢廣》、《汝墳》皆化被南國之徵，奈何必歸諸子虛亡是哉？……故魯韓並以《苕苕》為興，不以為賦。然其以澤瀉臭草，興君子臭惡之疾，而《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苕苕》，王充《論衡》云：伯牛病厲。取興之義，良在斯焉。⁶⁴

《苕苕》之事，由來已久，遠在文王之初已見。乃宋地女子，嫁入蔡國，貞一婦德，關乎夫婦大義之事，且較「婦人樂有子」為正大。雖蔡、宋無風，流傳授受而屬周南之詩，乃化被於南國之徵，王禮卿先生以為：

《苕苕》成詩之時：以毛序言「后妃之美」，政教「和平」推之，引申義當在文王化被南國之末；以彼證此，則本義當作於文王化及蔡宋之初。⁶⁵

依時代先後推之，確有可能。又如《大雅·洞酌》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陳奐於魯說揚雄箴云「此三家說，《洞酌》為公劉詩也」⁶⁶，陳喬樞亦云「此與揚雄箴合，是三家說同」⁶⁷（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與此意合，是三家說同），故知三家皆異《古序》，王禮卿先生分析道：

此篇則以濁變清，為興義所特著，而公劉以夏變夷，為周德之肇基，其義正大，其事正符，是以為今文家傳乘原始之詩旨，而為此詩之本義也。⁶⁸

⁶²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頁43-44。

⁶³ 劉向：《列女傳》（臺北：中華書局，1970.7），卷4，頁3。

⁶⁴ 魏源：《二南答問》，《詩古微》，《續修四庫全書》冊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0，頁144。

⁶⁵ 王禮卿：《大雅·洞酌》，《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10），卷一，頁190。

⁶⁶ 陳奐：《詩毛氏傳疏》，《續修四庫全書》冊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4，頁352。

⁶⁷ 陳喬樞：《齊詩遺說考》，《三家詩遺說考》，《續修四庫全書》冊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頁452。

⁶⁸ 王禮卿：《大雅·洞酌》，《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10），卷24，頁1670。

其說有理，順此理路則召康公誦〈泂酌〉美公劉詩，申爲薦祭，戒成王修德行道，故〈古序〉應屬引申義，本義或在三家。

平心論之，如果四家《詩》說皆同，《詩》本義自顯，貽孫斷定〈古序〉爲四家《詩》之本可矣，如〈甘棠〉、〈羔羊〉等詩皆是。然而三家《詩》對於〈采芣苢〉、〈泂酌〉等篇詮解，和《毛詩》差異甚大，又如何解釋？可見〈詩序〉發端一語，是否皆爲三百篇之古序，有商榷必要，而貽孫既看到了其他三家《詩》說，卻偏取《毛詩》文字，忽視其義理的大相逕庭，僅視作訓詁箋釋之材料，一味認爲四家皆從所謂的〈古序〉，則亦陷入失其古義的危機。簡言之，貽孫似有違例以尊〈古序〉，其次，既已申稱檢閱過三家《詩》，卻仍視四家《詩》之〈古序〉一也，僅當作旁證文獻，其實數家均有所長，若偏廢偏取，顯然是貽孫治《詩》之失誤。

結語

明代中後期，《詩經》研究漸由「經學」轉向「詩學」層面，晚明《詩經》文學評點達到高潮。不久，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詩經》研究走向復古道路，由考據學者所主宰。本文以賀貽孫《詩觸》爲研究對象，評述貽孫說《詩》主張、內容及方法，追問明遺民如何承、啓這塊《詩》學史的環節。首先，詮經立場，《詩觸》尊〈詩序〉發端一語，以爲〈古序〉，部分續序則因漢儒補入，遂真偽難辨，準此，則須折衷門戶，不主一家。又反對訓詁太甚，有害詩意，務得言外之意。再者，與朱《傳》頗多異同處，尤其是反對淫詩說，力主美刺微旨，均與時代思潮呼應。

《詩觸》內容帶有遺民色彩。蓋貽孫不作貳臣，乃遁入山林之隱士型遺民，然遺民的社會責任感，並未消失在貽孫身上，面對外在世界，仍表現出匡時濟世之士人精神。然而個人生命擇取，因飽嚙欺侮饑寒的經歷，迫使他不得不以達觀態度處世，凸顯出推崇隱士與道家保真的思維模式。故使得這部詮解儒家經典的《詩觸》，帶有儒、道互滲的意味。

貽孫以詩文批註方式詮解《詩經》，受到鍾惺等評點派影響，重視文學的解《詩》作法，包括以《詩》讀《詩》、以詩讀《詩》、以文讀《詩》，甚至以書畫讀《詩》等活潑作法，重視蘊藉和想像手法，都是晚明自由學風影響遺民之另一表現。再者，這些文學觀其實亦是從「解經」立場延伸，一以貫之。蓋貽孫《詩觸》雖無產生顯著影響，但其思維，以及就《詩》論詩的文學鑑賞，民國以來，漸被發現並重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學風幾乎是一味貶斥，貽孫仿鍾惺評點之方式，也遭受「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之批判，視爲解《詩》之「異端」！實乃清代官方學術氛圍使然。近代周作人提出相反見解：

其實據我看來這正是賀君的好處，能夠把《詩經》當作文藝看，開後世讀《詩》的正當門徑。此風蓋始於鍾伯敬，歷戴仲甫萬茂先賀子翼，清朝有姚首源牛空山郝蘭皋以及陳舜百。此派雖被視旁門外道，究竟還不落寞。⁶⁹

周氏正視到清代其實形成一股以《詩》讀詩的現象，並列明、清以降，姚際恒、牟運震、郝懿行、陳繼揆等以文學解《詩》的主要成員，時至今日，業已成為《詩》學史的重要研究路徑之一。在此遞嬗過程中，貽孫實是扮演著明、清之際的代表《詩》家，因此在這條隱顯不明的伏脈之中，勾勒並凸顯《詩觸》的時代意義，有其必要性。

最後，評述貽孫《詩觸》盲從古序所造成的失誤。雖獨尊〈詩序〉首句，卻為曲合其義，亦引他視之為漢儒續序的例子佐證，違反自己所立體例，反生強解之嫌；另一方面，貽孫一以〈古序〉為本，以為三家《詩》，僅訓詁箋釋之價值，忽略其《詩》義解說不同處，事實上，三家《詩》亦有不少優於《毛詩》本的解說之處，貽孫視而不見，反而自曝其瑕。

「遺民說經」是《詩》學史較為寂寥而值得開發之議題。本文深入歸納、評析賀貽孫說《詩》，呈現遺民多元類型中的一種形象，將其具備明、清之際的解經風格，以及沾染特殊的政治色彩，予以揭揚，並得以在明清之際的《詩》學史中，為《詩觸》樹其定位。

⁶⁹ 周作人：〈賀貽孫讀《詩》〉，《知堂書話》（臺北：百川書局，1989.12），卷（下），頁29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向：《列女傳》，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
- 〔唐〕鄭玄注：《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71年。
- 〔南宋〕朱熹集注：《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78年。
- 〔明〕賀貽孫：《激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94，臺北：莊嚴文化，1997年。
- ：《水田居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208，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
- ：《詩觸》，《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冊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陳孝逸：〈寄賀子翼〉，《癡山集》（清初刻本），卷6。本文乃檢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
-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彭士望：〈與賀子翼書〉，《耻躬堂詩文鈔》（清咸豐二年刻本），卷2。本文乃檢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冊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冊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月。
- 〔清〕魏源：《詩古微》，《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冊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二、近人論著

- 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2001年。
- 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
- 李兆祿：〈以“臆”說《詩》——明清之際《詩經》文學詮釋主體的張揚〉，《濟寧學院學報》2009年第30卷第一期第一期（2009·2），第30卷。
- 周作人：《知堂書話》，臺北：百川書局，1989年。
-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陳國安〈論清初《詩經》學〉，《蘇州大學學報》2007 第 6 期，頁 61-65。

費振剛、葉愛民著：〈賀貽孫《詩觸》研究〉，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453-468。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盧善慶、徐強、翁向紅：〈《詩筏》、《騷筏》中美學思想初探〉，《吉安師專學報》1999 年第 20 卷第 3 期。

錢鍾書：《錢鍾書論學文選》，廣州：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 年。

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羅天祥：《賀貽孫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 does interpret the Classics by loyalist: The Critique of Heh Yie Suen's (賀貽孫) “ Solution of Shi Jiang ” 《詩經觸義》

Chung Chih-wei*

Abstract

The academ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s differences, and, what kind of lookses about " the Book of Songs" is presented between Ming-Qing transition. Loyalist live through the change of dynasty, how to connect intermediate link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 the Book of Songs". Take a broad view of "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 "(《四庫全書總目》), " Solution of Shi Jiang " was as much praised as blamed., offer a lot of thinking space. I discuss the text from a ang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 the Book of Songs", comment stands, content and methods, try to find influence of the times. Heh Yie Suen is the leftover person in the Ming Dynasty, refusing the Qing Dynasty of Government's recruitment . Heh Yie Suen's Works numerous, "Solution of Shi Jiang" represent study theory about " the Book of Songs". It's eclecticism, besides, criticize to Zhu Xi (朱熹). Secondly, displaying his philosophic theory thought from it, and showing personal feature of the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Moreover, solve poem with literature, to touch on a lot of the devices, comparing with " the Book of Song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楚辭), poetry, prose and pictures. This phenomenon is quite rare. This text comments on the mistake finally. Even so, it contributed to subjoi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 the Book of Songs" academic research between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revealing its position , in order to solve me about all sor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queries.

Keywords: " the Book of Songs", Heh Yie Suen, "Solution of Shi Jiang", loyalist, Chinese classics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